

羞于承认的 “中国记者之父”



中国新闻事业的起源是在唐代，现藏于伦敦的《进奏院状报》是留存至今的第一份新闻信。这封信是唐朝一位节度使派驻在京师的工作人员写的。信里，工作人员向节度使报告其派往朝廷游说人员的工作状况。

不过，《进奏院状报》还不能算报纸，节度使的“驻京办”工作人员也算不上记者。中国真正的报业兴起于近代，在国门被炮火轰开，洋人带着西方思想登陆口岸之后。中国土地上第一批近代报刊由洋人创办，第一批记者也是在洋人报馆里成长起来的。

1874年，第一份完全由中国人管理而且取得成功的报纸出现，这就是《循环日报》。《循环日报》以政论著称，提倡洋务，鼓吹变法，开中国报纸评论的先河。

《循环日报》创办者王韬曾在洋人的书馆里工作过，他和同事们一起编译了不少天文学、光学、力学方面的理科书籍。王韬后来被林语堂尊为“中国记者之父”。

王韬在世时估计没料到自己能成为“中国记者之父”，如果当时他被人这么叫的话，肯定也不会觉得脸上有光。在那个年代，记者这个职业远不像后来那样被人认可。哦对了，那时候这职业还不叫记者，乱七八糟什么名目都有，最常见的叫“访员”，在当时的语境里带有轻蔑的味道。

在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前，科举取仕一直是文人的正途。记者属于“歪瓜裂枣”，文人里的“乞丐”。在王韬的年代，三年一次的科考来临之时，记者们都要跟领导请

假才能去考试，有点像今天公务员考试当天一些单位年轻人的集体失联。

民国年间著名记者陶菊隐在回忆录里写道，当年生活无着，想去办报当记者，家里人说他：“什么不能干，怎么去干那种没出息的事！”

新闻史专家们发现，这种对新闻记者的不认可，也导致早期中文报纸酸腐之气甚浓，纸上尽是风花雪月、之乎者也。

自然，以文人自居的王韬并不承认自己的主业是办报。他把自己写在报纸上的时评集结成书，冠以“外编”字样。“外编”相对于“内编”，那意思是雕虫小技，拿不上台面。

你可以想见这位“中国记者之父”跟大家辩白的样子：“我可不是专门写报纸的哈，大家不要误会，我也是搞学问的。请看我的《弢园文录内编》，我的专业其实是性理学术。”

世易时移，王韬或许没想到，现在大家早已搞不清“性理学术”是什么东西，报社工作反而成就了他的“功名”。

尽管记者在当时观念里属于文人中的末流，但报纸总归是一个言论平台，对于王韬这些走不通功名之路的文人来说，要实现他们济世救民的抱负，在报纸上发表言论不失为一条道路。

最近一段时间，记者的日子很不好过，“人人都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上大骂记者15分钟”。似乎姚贝娜的死，庞麦郎的惊惶，余秀华的走红，都是记者一手造成的。这些争论暂且按下不表，今天我们单纯聊聊历史，记者这个行业，是怎么进化来的？他们，喔，我们，该承担着怎样的责任？

记者从诞生之初就被偏见笼罩，地位还不如现在。在先辈们前赴后继的努力下，这个职业从不入流的“文人乞丐”，到举国趋之、帝王之师、国士礼遇，一步步挣得了地位。

本报记者 张亚楠

记者进化史—— 从“文人乞丐”到自诩国士

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在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精神领袖梁启超是近代第一位新闻大师。他一生创办了二十多种报刊，一手造就了维新变法时期最有名望的报刊——《时务报》。

《时务报》有点像梁启超一人开的原创公众号，每期两万多字，都是他一个人撰写、编辑，有点儿像今天一个人写《童话大王》期刊的郑渊洁，当然啦，题材不同。

《时务报》创刊号发表了大名鼎鼎的《变法通议》，因思想新鲜、文风活泼，梁启超一炮打红，赢得粉丝无数。

当时不少新潮的督抚大员，像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两江总督刘坤一都是梁启超的订阅者。后来梁启超回顾曾经的壮举，自我表扬曰：“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梁启超是个诗人气质浓厚的人，他的学生梁实秋说，他演讲到紧张处，手舞足蹈。“有时掩面，有时顿足，

有时狂笑，有时叹息。”梁启超的文风也是昂扬激愤、纵横驰骋。在语言上，夹杂俚语甚至外国语言，早期报纸的酸腐之气一扫而空，开创了独特的报刊文体——时务文体。现在新闻报道的文体和话语，都是由梁启超而起。

他的粉丝之一，近代报人、小说家包天笑说过：“《时务报》在上海出版了，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他（梁启超）说的话，就是我们蕴藏在心中欲说的一般。”他的挚友黄遵宪说梁启超的文字：“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可见，梁启超真是舆论大师。

辛亥革命前，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出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报刊取代梁启超的改良派成为主流，黄侃、于右任等报人风靡一时。但这些人更多被称为革命报人，而非记者，因为他们的社会影响和贡献首先是思想启蒙，其次是针砭时弊、舆论监督，最次才是报道新闻、传递信息这些最基本的新闻职业功能。

舆论大V梁启超 “举国趋之”



邵飘萍

毛泽东的新闻老师



面对民国时期新闻业党同伐异、敲竹杠的堕落状况，一份新生报纸喊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宣誓自己经济独立，不受政治、利益集团操控。这份报纸就是后来获得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年度最佳外国报纸奖的新记《大公报》。

新记《大公报》主编张季鸾是评论高手，下笔嬉笑怒骂、句句如刀，他从袁世凯骂到段祺瑞，都是当局最高长官。然而，他做人和蔼、敦厚，不拘小节、不修边幅，一派懒散的“名士”风度。

张季鸾的继任者王芸生说：“先生（张季鸾）之视报业，一非政治阶梯，亦非营利机关。乃为文人论证而设，而个人则以国士自许。”

对张季鸾，蒋介石确实是以国士待之。蒋介石在军阀混战时期，曾通过合纵连横铲平不少大小山头，然而，对张季鸾他一向礼遇有加。他每年都请张季鸾到他的庐山别墅度假，不经通报，张季鸾可以直接见他，或者打电话。1934年，蒋介石大宴群僚，数百高官显宦云集一堂，

唯独邀请张季鸾坐在首席，两人把酒言欢，谈笑风生，当时在座之人颇有“韩信拜将，一军皆惊”之感。

当代学者研究档案获悉，1940年，张季鸾曾受命蒋介石前往香港与日本人谈谈判议和，虽因种种原因导致谈判中途夭折，但仍可见蒋介石对张季鸾的倚重。而张季鸾曾特意交代王芸生：“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

张季鸾说：“我的人生观很迂腐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

中国记者的历史，是中国知识分子争取言论自由的历史，背后是一股精气神。弹指一挥间，记者从现代走进当代，新中国建立后，记者行业发挥了更加巨大的作用，可各种各样的改变也在这些年里悄然发生。

站在这个“人人都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上大骂记者15分钟”的寒冷冬天，回顾行业的荣耀，看看先辈们开疆拓土的过去，我们可以感到一股温暖。从“最不宜人类的的工作”的悲叹里抬头，出发寻找弥合行业与社会裂隙的方式。

条件收买了他的一个朋友，将他骗出饭店，逮捕枪决。

邵飘萍不仅是新闻记者，还在多所大学担任新闻学教授。他在北大教书时，毛泽东是其中一名旁听生。听过邵飘萍的新闻学课程后，毛泽东深受鼓舞，在新民学会发言时说：“我愿做的工作，一是教书，一是新闻记者。”

当然，后来毛泽东既没有做成老师，也没有做成记者。不过，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新华社好好过了一把记者的瘾，写下了不少新闻稿，像《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等消息和《别了，司徒雷登》等评论，曾风趣地自夸为“新华社最好的记者”。

五四时期，报纸在经济上不能独立，接受权贵“馈赠”的不止邵飘萍。傅国涌在《追寻失去的传统》中说，与邵飘萍齐名的著名报人林白水，“常常把犀利的笔尖指向政府财政机关，利用内幕新闻敲竹杠，他打算向人要钱，就指名大骂一顿，‘给钱就不骂，绝不恭维’，权贵们又怕他，又恨他。当时曾任财政次长、总长的李思浩回忆，对《新社会报》‘要给以相当数目的资助’，对总编辑胡政之则‘每月送到三、四百元，从未间断’。”

张季鸾 享国士礼遇



本文参考书目：

《中国新闻社会史》 作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

《追寻失去的传统》 作者：傅国涌

《尘封下的真相：解读蒋介石亲自修改的一组对日议和文件》 作者：王建朗

《张季鸾庐山三主谏蒋介石》 作者：贺伟

感谢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王咏梅